

## 从《南游日记》说明两个疑问

夏东元

《南游日记》是郑观应于一八八四年法国侵略中国和越南战争中，到南洋一带进行抗法活动时所写。过去我只在《盛世危言后编》卷十五中看到《南游日记序》，没有见过《日记》。前几年得海外学者之助，获得了《南游日记》原稿影印本。这本日记已收入我所编的即将出版问世的《郑观应集》上册。

《南游日记》表现了郑观应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史料价值较高，这里不来全面介绍。本文只谈一谈我以前未能解决的两个疑问。

其一，郑观应关于经济与政治、科学与民主关系的论述的渊源，和常被人们引用的《盛世危言自序》中张树声所讲的一段话的思想谁属的问题。我在拙著《郑观应传》中说过，郑观应的思想核心可以概括为“富强救国”四个字，达到“富强救国”目的的手段主要有两根杠杆：一个是学习西方科学以发展近代工商业，另一个是实行资本主义国家君主立宪式的民主制度。“富强救国”的目的，以及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构成了郑观应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是逐步形成的，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郑观应说他于一八六五年前后几年跟傅兰雅学习英语时，即已“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sup>①</sup>了。然而，在此后逐渐辑著成功并于一八七三年刊行的《救时揭要》，并没有明显表现出民主政治与科学技术相联系的两科学问。到一八八〇年刊行

<sup>①</sup>郑观应：《禀大商部条陈六弊请通飭各商总会举调堂员互相砥砺事》，《后编》卷八，收于《郑观应集》下册（即出）。

的《易言》三十六篇本，与大量的论述关于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列有《论议政》<sup>①</sup>专篇讨论君民共治的民主政治问题，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实行这种君主立宪式的民主政治制度。但是，在《易言》中，实行君主立宪的民主制，与近代工商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什么有机的联系，则没有说明。在过去，一般都认为郑观应把科学与民主、经济与政治，作明确的有机联系的表述的，是一八九二年所写《盛世危言自序》中假借张树声之口所讲的下述一段话：

“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至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体”，是与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所以它们“驯至富强”；另一层是说，中国的封建主义的“体”，是与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不相适应的。从“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以及“用”不管怎么发达而“果足恃欤”的口气看，当然是主张把“体”作相应的改革以与西学的“用”相适应。这种认识显然是先进的。这一先进思想主要是张树声的还是郑观应的？一般地说当然是郑观应的，但无确切依据、《南游日记》解决了这个问题。郑观应在闰五月十九日旅次新加坡时的日记中写道：

“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

<sup>①</sup>《郑观应集》上册，第103页。

多扞格，难臻富强。”<sup>①</sup>

这段话的意思与“自序”中张树声所讲的是一致的。因此，一八九二年在“自序”中张树声所讲的话，不仅可看作郑观应自己的思想，而且这种思想早在一八八四年已经形成了，它比之“自序”中所讲要早八年之久。这个认识水平在那时是仅见的。

讲到这里发生了两个问题：（一）明明是郑观应的思想，怎么放到张树声的头上呢？郑与张究竟是什么关系？（二）张树声是洋务大官僚，官居两广总督这样的高位，这种人也能有这样高的认识水平吗？

首先说明第一个问题。一八八四年三月十五日郑观应到达广东，首先去谒见时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和粤东防务钦差大臣彭玉麟。谈论中张对郑就很器重，称之为“通达交涉事宜”<sup>②</sup>的办洋务能手。郑对张也是很推崇的，说他是“朝夕饮冰素志，从容运甓励丹心”<sup>③</sup>。张、郑在交谈中，很可能在讨论到富强之术和体用关系等问题时，提到“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以致不能达到富强目的的见解，张树声深表赞同并加以附和。郑观应为了借用张树声的地位以加强这一理论的宣传力量，故于一八九二年写“自序”假张树声之口表达了出来。因此，这一先进思想当然是郑观应的，但既为张树声所接受也不能认为不是张的见解。

于是，这就涉及到上面所提的第二个问题，即张树声是洋务大官僚，怎么也会赞同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度呢？在我看，这是有可能的。我曾说过，洋务运动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的创办和发展，随着西方科学技术和新的文化的引进和学习，必将对洋务派官僚所要保护的封建主义的“体”起着腐蚀破坏作

<sup>①</sup>见《郑观应集》上册，第967页。

<sup>②</sup>郑观应：《稟复粤督张振帅札委赴港提回购炮事》，《后编》卷五，《郑观应集》下册。

<sup>③</sup>郑观应：《镜张靖达官保师》，《罗浮侍鹤山人诗草》卷一，《郑观应集》下册。

用，“历史的逻辑必将走向洋务派所预期的反面”<sup>①</sup>。拿张树声本人说，他在几十年的洋务实践中扩大了眼界，又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有许多投资，资本人格化地体现在张树声身上，他已不完全是封建官僚，而一定程度上具有资产阶级的身份了。象张树声这种类型的人，在实践中对于封建专制不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状况有所体会是必然的，思想深处有改变旧的政治制度的倾向是可能的。这不仅在张树声身上看到，其他洋务官僚也有类似情况。例如，始任江苏藩司后任安徽巡抚的邓华熙就是如此。他在一八九五年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推荐给光绪皇帝的时候，说了如下的一截话：“夫泰西立国，具有本末。广学校以造人材，设议院以联众志。……然后恃其船械，攸往咸宜。今中华不揣其本而末是求”<sup>②</sup>，所以不能达到富强的目的。以上事实表明，在洋务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洋务派一般成员不少转化为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即使洋务大官僚也是有向改良主义转化的倾向的。兹所以说是一种“倾向”，就是说洋务大官僚要最后变为一个改良主义者是很艰难的，他们仅有改良主义思想萌芽，这个萌芽是自发的，没有形成思想体系，更不能在行动上付诸实践。因为真正成为改良派就意味着相当大的程度作自我的质的否定，而这是很难办到的。对洋务大官僚的某些人说，他们只是在洋务运动发展过程中，不自觉地“对体的自我破坏”<sup>③</sup>，从而不自觉地对旧的封建的我作一定程度的否定，这种否定，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看，显然是一个进步。

《南游日记》中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体”与“用”的关系和清政府“遗其体而效其用”的论述，从而说明经济与政治、科学与民主的有机联系的见解，它向前推到一八八四年，证明是

①拙作：《洋务运动简论》，《文汇报》一九六三年四月三十日。

②见《盛世危言》卷首，《郑观应集》上册，第226页。

③见拙作：《洋务运动发展论》，《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〇年第三期。

郑观应最早提出来的，同时，也解决了《盛世危言自序》中假张树声之口所讲的体用关系的一段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证实了这段话的渊源。

其二，根据日记所载具体的讲一下关于《盛世危言》的写作时间，和彭玉麟于光绪十年为《盛世危言》所写的《序》<sup>①</sup>相矛盾的问题。

在过去，学术界对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是在《易言》基础上扩写而成这一点，已无疑义。但是，为什么要将《易言》扩写为《盛世危言》？《危言》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什么时候著成，什么时候刊行？则说法不一，相当混乱。有的说是一八八四年写成，这是因为书首有彭玉麟光绪十年所写的“序”；有的说是一八九二年写成并刊行，这是因为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注明光绪十八年的缘故。我在《郑观应思想发展论》<sup>②</sup>一文中否定了一八八四年说，肯定了一八九二年基本完稿，刊行吋至早当在一八九三年冬。兹后又在拙著《郑观应传》中重申了这种看法，并把刊行时间改为一八九四年秋冬间（见该书第65—67页）。由于我在编《郑观应集》时新发现了《盛世危言》更早的版本，于是否定了《盛世危言》最早刊行时间是“一八九四年秋冬间”的说法，而认为最早问世应在一八九四年夏”<sup>③</sup>。关于《盛世危言》的写作时间，我作了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一年间闲居澳门期间的推测。我的上述那些说法，《南游日记》提供了一定的论据。郑观应在闰五月二十一日的“日记”写道：

“晨起，披阅《易言》，觉昔日见闻，以今日证之，多未透澈。”<sup>④</sup>

这几句话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郑观应发觉《易言》的不足之

① “彭序”见《郑观应集》上册，第227页。

② 见《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③ 《郑观应集》上册《编辑说明》第2页注②。

④ 见《郑观应集》上册第969页。

处，是在一八八〇年刊行之后四年，这表明一八八四年时《盛世危言》还未着笔，不过由于“多未透澈”而酝酿着扩大和修订或重写；第二个是说明《盛世危言》的辑著不是在一八八四年以前而是在一八八五年以后几年了。这样的判断是符合郑观应当时的工作情况和处境的。一八八〇年刊行《易言》之后几年，郑观应的工作是非常繁忙的。他既是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又兼洋务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的会办、总办，一八八二年二月虽辞去太古买办职务，但又专任责任更重的轮船招商局帮办；他既要外与怡和、太古两轮船公司交涉和竞争，又要费很多精力整顿内部。在招商局不到两年即去广东参加抗法工作。繁忙的情况，确如他自己所说，“事有百端之集，身无一日之安”<sup>①</sup>，是很少有空余时间考虑写作象《盛世危言》那样的大部头著作的。因此，《危言》写于一八八五年后郑观应闲居于澳门期间是可靠的。

那末，彭玉麟于光绪十年为《盛世危言》所写的序言怎样解释呢？“彭序”末尾说“甲申冬日衡阳彭玉麟序于海南军次”。“冬日”一般说就是冬至日，也即是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从郑观应“披阅《易言》”至八月十二日回到广东，正好是一个月，回广东后到一八八五年初去香港，这四个多月中多数时间是在彭玉麟左右。虽也较忙，但比之先前要稍微闲空一点。在这四、五个月时间里，一方面考虑如何将《易言》扩大、修订和重写，另一方面也有机会接近彭玉麟并请作序。《危言》虽未属稿，作为《危言》的基础的《易言》，却可以作为“请序”的根据和蓝本。因此，“彭序”虽已写就，但《危言》并未著成，而是到一八八五年夏，郑观应从香港拘留解脱之后才逐渐提到写作的日程的。我认为，这是从“披阅《易言》”的日记，对“彭序”和《盛世危言》写作时间的关系的比较符合事实和情理的解释。

<sup>①</sup>上海图书馆藏未刊资料：《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